
March 2015

How to Understand the Interdisciplinary of Cultural Studies: Taking Hoggart's *Uses of Literacy* as an Example

Jia Ya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Yan, Jia. 2015. "How to Understand the Interdisciplinary of Cultural Studies: Taking Hoggart's *Uses of Literacy* as an Exampl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5, (2): pp.154-162.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5/iss2/5>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如何理解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 以霍加特《识字的用途》为例

阎 嘉

摘 要: 理查德·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开创了文化研究跨学科性的基本研究范式,其核心在于:从社会生活之“活的文化”出发,研究文学文本,尤其是要研究通俗文化的文本如何影响和塑造人们(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而不是研究那些由专家、学者们确定的“经典文学作品”的文本。按照这一宗旨,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在其起源上就决定了它与文学、通俗文化和社会学的亲缘关系,而且在实质上构成了文学研究的一条新路径,即有别于正统和经典文学研究的路径。这条路径带有鲜明的阶级、政治、性别和意识形态的色彩。

关键词: 霍加特; 《识字的用途》; 文化研究; 跨学科性; 文学研究

作者简介: 阎嘉,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和艺术学理论研究。本文为2013年度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项目编号:skqy201320]的阶段性成果。电子邮箱:yanjia9956@163.com

Title: How to Understand the Interdisciplinary of Cultural Studies: Taking Hoggart's *Uses of Literacy* as an Example

Abstract: Richard Hoggart's *Uses of Literacy* established the basic paradigm for the interdisciplinary nature of the 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essential principle is to start from the “living culture” of social life, to study literary texts, especially the texts of popular culture rather than to study the texts of “classic literary works” determined by some experts and scholars, and to find how the texts influence and shape the everyday life of people (especially the working class). This purpose of cultural studies has entailed its genetic relationship with literature, popular culture and sociology, and in essence constituted a new way of literary studie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orthodox and classic way of literary studies. This way of literary studies has taken on its distinctive colors of class, politics, gender and ideology.

Keywords: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cultural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nature; literary study

Author: Yan Jia, Ph. D., is a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with research focuses on art theory and literary theory. Email: yanjia9956@163.com

1957年,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创始人之一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1918年-2014年)出版了其文化研究的奠基作《识字的用途》。1964年,他在伯明翰大学发起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并担任该中心主任至1968年。从此,文化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在西方学术界和大学体制内渐次展开。文化研究从诞生伊

始,就打上了跨学科的印记。在这种印记的背后,至少有几条重要的脉络与文化研究有着密切关系:第一,文学批评(特别是利维斯主义的影响);第二,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对工人阶级问题的关注(与雷蒙德·威廉斯、爱德华·汤普森等“新左派”学者有关)和社会学研究;第三,20世纪早期欧美通俗文化的发展演变。

霍加特作为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的“奖学

金男孩”(scholarship boy),通过自身的奋斗,最终跻身于大学精英知识分子阶层。他对文化研究的理解,首先基于他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切身体验。以此为基础,他试图将文学批评、社会学分析和各种通俗文化样式对工人阶级的影响缝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不符合现代大学学术体制规范与学科体制的文化研究方法。正如他在谈及自己的《识字的用途》于1950年代晚期在学术体制内产生的反响时所说“我所认识的英语系[……]内部的很多人,一直都对该书保持着缄默,就像一只从隔壁简易住宅里跑来的下贱的猫,把一个成天发臭的东西带进了屋里”(Hoggart, *Sort of Clowning* 143)。

霍加特开创了一种跨学科的文化研究的方法,凸显了文化研究对社会问题、政治问题、阶级问题、性别问题、价值问题的强烈关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跨学科性和现实关怀,聚焦于当代社会生活中“活的文化”及其个案研究,与后来的文化研究关注文本研究的理路有着明显的差异。因此,重温《识字的用途》,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霍加特开创“文化研究”这一学科的原初宗旨。

一、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越界

众所周知,196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文化研究,与一批出身于中下层阶级、依靠个人奋斗并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学者有关系。其中,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E. P. 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被公认为这个领域开创性的奠基作。如果我们承认这种定位的话,那么,在这种关系中,我们必须注意到文化研究在起源上与文学研究的亲缘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学研究在价值取向上的分野。

首先,我们要注意到,霍加特与威廉斯一样,都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有着共同的个人经历和知识背景。尤其是,他们在成为大学教师之前,曾经长期担任工人成人教育的教师,在工人成人夜校里授课。这种共同经历使得他们在身份认同、个人趣味和感受、对于新学科的构想等方面,表现出诸多一致性。在进入大学教育体制之后,他们经常显得不适应大学正统的学科体制和规范,常

常越出既定的学科边界,把学术研究同个人经历和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开创出一些“不合常规”的研究领域,如霍加特对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的“奖学金男孩”的“焦虑和无根状态”(“the anxious and uprooted”)的研究,威廉斯对于自己生长于威尔士与英格兰交界地区的“边界乡村”(“border country”)的研究,日后都成了英国文化研究中的经典个案。

后来,霍加特在与英国媒介研究学者约翰·科纳(John Corner)的访谈中做过如下的清晰陈述:

那时我在东北部赫尔大学的校外课程中任教,地点远在赫尔本身以北100英里;我在“工人教育协会”和扩展课程班任教大约有五六年时间。任何对待这项工作严肃认真的人——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那时都在研究利维斯、《细察》群体、丹尼斯·汤普森和利维斯夫人的著作——都对通俗文化具有特殊兴趣。还不止这一点,还有大众文化。我们都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如果我们讲授文学的话,由于我们的学生来到这里,他们通常学习的几乎都是利维斯主义意义上的“经典”文学,而他们却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们生活在报纸、杂志、收音机(当时没有电视)和通俗歌曲的世界里。在很多校外教师当中,对理解这一点有着附带的兴趣。我们从整个《细察》和利维斯小组那里,确实学到了很多。(Corner 271)

这段陈述为我们透露出了这样一些关于文化研究缘起的重要信息:文化研究的缘起与霍加特早期在成人夜校从事文学教学活动有着直接关系。在那时,他(包括威廉斯等人)深受F. R. 利维斯、其夫人Q. D. 利维斯、其同事丹尼斯·汤普森等人以及他们创办的刊物《细察》(*Scrutiny*)的文学观的影响,并在工人夜校中践行这种文学观,注重通过对经典文学文本的细读,来达到改造人性、使人变得高雅的目的。然而,霍加特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利维斯主张的“少数人”或精英主义的文学观,并不适合工人成人夜校学生的实际情况

与审美趣味,他们生活在由各种通俗文化形式构成的“另一个世界”里,即大众文化的世界。很明显,利维斯这位在1930年代具有极大影响的“经典”文学倡导者的观点,与大多数劳动阶层民众的审美价值取向,出现了难以调和的背离。

中国学术界对F. R. 利维斯的文学思想并不陌生,他的代表作《伟大的传统》(1948年)已被翻译为汉语并出版。在《伟大的传统》中,利维斯依次分析和论述了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以及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利维斯在书中开宗明义地说明了选择这几位小说家作为研究对象的缘由:“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都是英国小说家里堪称大家之人”(1)。而“所谓小说大家,乃是指那些堪与大诗人相比相埒的重要小说家——他们不仅为同行和读者改变了艺术的潜能,而且就其所促发的人性意识——对于生活潜能意识而言,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利维斯 3-4)。“如此这般强调为数不多的几个出类拔萃者,并不是要漠视传统;相反,理解传统之义正该由此入手”(利维斯 4)。利维斯做出这样的判断,正值英国文学研究刚刚进入大学教育体制不久之后,此举意在为大学的文学教育制定评判的标准,以挽救正统文学在通俗文化冲击之下的衰颓之势。

出身于精英阶层的利维斯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工业革命之前、17世纪的“有机社会”。他认为,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社会造成了文化上的堕落,其标志就是文化的标准化和平庸化。担负着社会和道德使命的文学,理应在这种情势下挽狂澜于既倒,坚持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抵制各种通俗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的泛滥和冲击。对正统文学衰落的忧虑感,在F. R. 利维斯的妻子Q. D. 利维斯的代表作《小说和阅读公众》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她认为,在笛福和班扬的时代:

一代又一代乡野民众为了某种目的而活着,他们除了《圣经》之外,没有任何书籍可资帮助。然而,这是一种真实的社会生活,他们所拥有的生活之道遵循着自然的节奏,以真正的[……]或“创造性的”兴趣为自己所需——乡间艺术,传统手工艺,游戏和歌唱,完全不

同于那些打发时光的兴趣,诸如听收音机和留声机,一字不漏地读报纸和杂志,看电影和商业足球赛,以及与汽车和自行车有关的活动,这些都是现代城市居民所懂得的唯一消遣方式。(Q. D. Leavis 209)

由此可见,霍加特在早期虽然深受利维斯夫妇的影响,但在后来的从业过程中逐渐显露出来的出身和趣味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他必定会与“利维斯主义”通过文学表现出来的“少数人文化”分道扬镳。这种分野的根本标志在于,利维斯要通过“经典”文学文本来研究并弘扬“少数人文化”。在他看来:

在任何时代,明察秋毫的艺术和文学鉴赏,始终都只能靠极少数人。除了非常明显和众所周知的个案,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出并非人云亦云的直接评判。今天,他们依然是少数,尽管人数业已众多,但他们却能根据真正的个人反应来做出直接评判。而流行的价值理念就像纸币,其基础是数量很少的黄金。(F. R. Leavis 3)

然而,霍加特从工人和成人教育的教学实践中发现,比理论研究更重要的是关注人们如何生存,关注一种“活的文化”。就普通大众和工人阶级而言,这种“活的文化”就是他们每时每刻生活于其中的社区环境、通俗音乐、通俗小说、电影、无线电广播、广告、各种报刊等等,它们属于“这个世界”;而利维斯等人所坚持的“少数人文化”的确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

霍加特和威廉斯在回顾与利维斯主义的分道扬镳时,依然非常清楚地记得自己选择的的目的性和缘由——根本的分歧在于他们对当时方兴未艾的通俗文化之崛起的不同态度和评价。霍加特在与约翰·科纳的访谈中说:“在撰写教科书时,我变得越来越不安,尤其是对利维斯夫人的著作感到不安,因为我是《小说与阅读公众》的主要赞赏者,但在另一方面,我感到存在着一种分离,即她所写到的与她无法理解的题材的分离,以及她所做的与它们对人们来说的真实意味的分离”

(Corner 271)。“所有这一切使我对我始终认为的利维斯夫人‘偏狭’的方法感到不安:她认为,人们都是白板[……]”(Corner 272)。在此基础上,霍加特正面谈到了自己写作《识字的用途》的真实意图“我试图写出那种文化,这是在人类学的意义上,而不是在艺术的意义,即我所了解的工人阶级文化;它是我了解的惟一的文化”(Corner 272)。他明确提出,他要写出工人阶级生活中“民族志的”细节,而这正好是与利维斯等人的主张背道而驰的。

重要的问题还在于,霍加特在突破文学研究的边界时,具有一种方法论上的自觉。他认为,他写作《识字的用途》和创办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目的之一在于:“我在其中努力要表明的是,如果你试图逐渐形成作为常规文学文本批判性读者的各种技巧的话,那么,它们也可以适用于其他文本。这就是我创办伯明翰中心的原因。相似地,倘若你开始书写你自己的生活,那么,你会就它提出某种使你能够评价文学的评价”(Corner 273)。

由此,我们可以借前文中霍加特那个不无幽默的说法得出结论说,他这一只从研究英国文学“伟大传统”的“隔壁简易住宅”里跑出来的“下贱的猫”,把研究工人阶级“活的文化”和通俗文化这个“成天发臭的东西”,带进了向来被认为“神圣”的大学教育体制中。他不仅越出了传统文学研究的藩篱和边界,而且使文学研究走向了与精英文化相反的通俗文化方向。

更明确地说,《识字的用途》从文学和文学批评出发,突破文学的边界,进入到阶级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领域中,把个人传记、社会历史和文化批判融合起来,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突破文本细读和单纯技术分析的学科规范,突显了文学阅读对人们性格和思想的塑造作用与影响。与此同时,霍加特十分注重文学批评的价值关怀、价值立场,关注文学是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活。正如为《识字的用途》作序的美国旧金山大学文化研究教授安德鲁·古德温(Andrew Goodwin)所说:“《识字的用途》所取得的成就在于,它与那个时代的主导规划决裂,以及它敢于和必须努力挑战文学、政治和社会学研究之间的学术障碍”(X vii)。

二、从文学研究跨越到社会学研究领域

尽管霍加特不满于F. R. 利维斯和Q. D. 利维斯的精英主义文学观,但他自己从未否认过得益于利维斯夫妇,尤其是在文学研究的方法方面得益于他们,即利维斯夫妇所强调的对文学文本本质的真实感受,以及细致的文本分析方法。科纳对此看得非常清楚:

在把细致分析的文学方法与探究更加普遍的社会意义和社会变迁结合起来方面,“文化研究”在批评家F. R. 利维斯和Q. D. 利维斯所做的工作方面,以及在1930年代与剑桥《细察》杂志有联系的群体成员方面,都有其先驱。但现在,它以一种新颖而直接的方式,将自身定位于当前的文学、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聚集点之上,尤其是要通过致力于研究社会阶级不平等和阶级体验等问题来这么做。(Corner 269)

由此可以看出,开创文化研究这一学科的初衷,原本就是要关注“经典”文学研究不会、也不愿意涉足的阶级问题,而对霍加特来说,这个问题具有无可回避的重要性。

在另一方面,霍加特所开创的文化研究,具有一种不同于学院式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独特性。那个时代主流的学院式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注重的是不作任何评价的价值中立的立场,重视理论优先和理论化(尤其是结构主义功能学家的理论),以及定量分析的方法。而霍加特进行研究的出发点却是工人阶级活生生的日常生存状态。他通过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描述(劳作、家庭生活、饮食起居、休闲娱乐等)和分析,突出了文化研究所强调的阶级立场和性别立场,而不是刻意进行抽象的理论分析。这种将个人价值立场贯穿于具体描述和分析中的文化研究方法,充满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不符合学院式的社会研究的规范,但却对后来的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据霍加特事后回忆,在《识字的用途》出版之前,他在赫尔大学的一位研究历史的教授建

议他不要出版此书,理由是这对他晋升英国文学教授会产生不利影响。同在赫尔大学任教的马克思主义艺术批评家 F. D. 克林根德尔(F. D. Klingender)则认为,《识字的用途》把工人阶级表现得非常消极,破坏了他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看法,他因此极其不喜欢《识字的用途》。然而,霍加特在与约翰·科纳的访谈中明确表达了自己当初的想法:

我不是要描绘工人阶级的全面图画:我要重新创造我所了解的工人阶级的生活,那是一种以妇女为中心的生活。一个不幸的六口之家,有四个女人——祖母,两个未婚的姑妈,一个未婚的堂妹——一个有一份白领工作的叔叔。就他们想到的政治而言,有恭顺的英国保守党党员,完全没有任何进入家庭的男性工人。为了写到生活的其他方面,我可能不得不努力成为一个准社会学家,而我对此什么都不了解,所以,我不会为没有提及其他方面而道歉。但是,完全可以公正地说,工人阶级生活的图画是非常不完整的。以妇女为中心这一事实是不可避免的,部分因为我的家庭是以妇女为中心的,也因为对在学业上会更进一步的孩子们来说,在工人阶级的生活中,几乎总是妇女们才关注这一点。(Corner 274)

实际上,克林根德尔与霍加特的分歧在于:前者从某些固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出发,从某种“理论的”角度俯视英国工人阶级的真实生活状况,对抽象的理论概括和分析更感兴趣。后者则从自己的亲身体验出发,要写出英国工人阶级的复杂性、多面性和具体性,写出“我们”(工人阶级)与“他们”(工人阶级之外的其他阶层)之间的差异和联系,写出英国工人阶级“顺从”和“表达愤怒”的独特方式,要刻画出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生动的细节。

据我统计,在《识字的用途》近25万字的正文里,“工人阶级”一词出现了487次,“阶级”一词出现了676次(其中部分与“工人阶级”重合),“女人”一词出现了74次(“男人”则出现了90

次,“女性”一词出现了65次,“男性”则出现了8次)。霍加特所描述的一些典型细节包括:报纸包装上残留着的炸鱼和薯条的味道;外省公共图书馆里的特殊气氛;1930年代的薄荷硬糖的味道;星期天混杂着烤牛肉味道阅读《世界新闻报》;工人阶级家庭在日子不错之时的温馨和“令人窒息的关注”;工人阶级住宅的投币电力系统;工人阶级父亲在思考时抓耳挠腮样子;纵容为普通人提供帮助的“救世军”的传统等等。所有这些细节,都抓住并凸显了英国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某些真实品质。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对工人阶级在日常生活中的“乐观主义”的描述:

[……]对工人阶级民众来说,愉快的结局,经常都是他们拥有的自己身边的那种生活、家庭和家人的愉快结局;而在那种生活中,结局是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之时,是云层都已被吹走之时。他们知道,生活实际上并不像那样;他们并不期望在某种模糊的未来,生活永远都像那样。但是,他们认为,“很好的是想到”一种像那样的生活;而在我看来,这种态度经常都接近于一种幻想,是对另一种秩序的一瞥。(Hoggart, *Uses of Literacy* 182-83)

霍加特的细致描述告诉我们:他所亲历的英国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虽然关注基本的日常温饱问题,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节俭度日,但他们却很少表现出强烈的物质欲望或占有欲。他们在艰难的生活之余,经常会主动寻找生活中的乐趣。而工人阶级在寻找乐趣方面所拥有的“道德资本的股份”,来自于一种代代相传的民间文化。这种文化是抵抗通俗文化中的那些“炫耀性的野蛮”、“华而不实和虚伪的傀儡世界”、“无止境落下来的彩色文学纸屑”、“虚假的归宿感”、“熟牛奶味道中的精神干枯”的主要防线。

同样经典的还有对“奖学金男孩”的“无根状态”的描述:

他脱离了自己的阶级,至少在精神上,在某些方面变得不同寻常;而他在另一个阶级中仍然不同寻常、过于紧张和

过于纠结。有时,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可以在一起笑。他却极少笑;他很勉强地在嘴角露出微笑。他通常都对中产阶级惴惴不安,因为就他自己的某个方面而言,他不想让他们接受他;他不信任他们,甚或有点鄙视他们。他在这方面就像在其他很多方面一样是分裂的。(Hoggart, *Uses of Literacy* 233)

可以说,任何意义上的社会学研究,都不可能提供这种生动细致的细节描述。英国社会学家、伯明翰大学教授弗兰克·韦伯斯特(Frank Webster)对《识字的用途》做过这样的评价:“它从文学出发,突破文学的疆界进入到各个新领域,那些领域对战后英国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尽管如此,虽然它显然把握住了社会的变化(社会学主要关注的方面),但《识字的用途》并不属于社会学。至少它本身是不合格的,因为它缺少理论,而且其方法明显不适合于社会学”(Webster 80-81)。韦伯斯特的意思是说,《识字的用途》虽然不合社会学研究的规范,但它所提供的对于工人阶级生活有血有肉的描述,是绝大多数社会学理论和定量分析所无法提供的。或者说,它不属于社会学,却击中了社会学研究的命脉。霍加特本人也明确地说过:“我试图去做的事情,就是要宣称:文学批评的方法,经常是利维斯式的方法,是仔细的分析,倾听文本,感受文本及其质地,它们都可以转换成通俗文化研究;不仅是词语,也有意象。它们可以转移到无论怎样的社会学方法中,正是这些方法,给你提供了对于广告所做的、你听到的或者看到的东西之内在性质的感觉”(Corner 278)。

《识字的用途》出版之后,也有人指责霍加特在书中对工人阶级“有机的”生活进行了“浪漫化”,做出了过高的评价,却忽视了工人阶级生活的消极和刻板的方面。霍加特对这种指责进行过冷静的反思:

我在心里考虑过这种指责,没有发现任何感情用事;那是一种极其合适的情绪。但是,看来正确的是,它确实带着极大的热情谈到了工人阶级生活的某些方面,情感的某些方面,尤其是谈

到了女性们在共同持家方面的重要地位。我不得不得出这一令人悲哀的结论,即某些知识分子发现很难对善良的情感进行称赞,很难称赞别人在情感方面做得正确的事情[……](Hoggart, *Sort of Clowning* 143)

作为文化研究学者,霍加特的立足点是自己的切身体验,力图将文本分析的细致方法延伸到工人阶级“活的文化”之中。这一独特的切入点,的确是对社会学学科的僭越,更是命中了社会学研究难以触及到的“死穴”。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识字的用途》虽然不符合社会学的学科规范,但却捕捉到了社会学研究无法把握到的社会生活的生动个案和细节,同样也提出了社会学研究难以提出的阶级与性别的具体问题。

三、着力关注通俗文化对工人阶级的形塑作用

从20世纪早期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在工业和技术方面的发展,通俗文化涌现出了各种前所未有的新形式,诸如好莱坞电影,自动点唱机,爵士乐,摇滚乐,流行歌曲,各种美女图片,彩纸文学,侦探小说,粗俗杂志,电视肥皂剧等。这些新兴的通俗文化样式对社会的中下层阶级,尤其是对工人阶级的精神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通俗文化,正日益面临着强势输入的美国通俗文化的冲击,纷纷仿效美国通俗文化的样式、设计、制作流程和营销方式。所有这一切,特别是色情与暴力通俗小说,对工人阶级青少年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其形塑作用不可低估。

在《识字的用途》第二部里,霍加特集中分析了1930年代英国通俗文化的主要样式,及其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他力图还原当时的社会语境,试图提供一种植根于社会语境的文化研究的范型,关注社会语境中的消费话语形态和意识形态关系。据我统计,在《识字的用途》中,“文学”一词出现了36次,相比之下,“小说”则出现了137次。“高雅”一词出现了5次,“严肃”一词则出现了38次,而“通俗”一词竟出现了133次。由此可以看

出霍加特关注的焦点之所在。

在霍加特的描述中,最典型的形象大概是那种在奶品点心铺里消磨时光的“电唱机男孩”们。他们大多是年龄在15岁到20岁之间的男孩,“穿着悬垂式西装,戴着花领带和美国式垂边帽”,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买不起某个系列的牛奶混合饮料,而是沏几杯茶,度过一两个小时的时间——这是他们来这里的主要原因——他们把一个又一个的铜币投进机械式电唱机。任何时候都可以得到大约一打唱片;按一个编号按钮,就得到一张想要的唱片,挑选唱片是根据按钮与标题的对应关系。租赁公司大约每两个星期更换一次唱片;几乎所有唱片都是美国的;几乎所有唱片都是“唱歌的”,而歌唱风格比通常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轻松节目”里听到的超前了很多。有些曲调很迷人;所有曲调都为表演作了修改,因而,它们具有的那种节拍在当时很流行;手法多半是由回音室录音提供的“空虚的宇宙”的效果构成的。歌曲的演唱非常精准,而且演唱能力极强,允许“投币式自动点唱机”大声播放……年轻人们摇晃着一只肩膀,或者瞪着眼,穿过管状折叠椅,就像汉弗莱·博加特那样不顾一切。(Hoggart, *Uses of Literacy* 189-90)

在霍加特看来,“电唱机男孩”的这种打发时光和寻欢作乐的方式,代表了那个时代特别单薄、特别苍白的一种消遣形式,他们生活在一个似乎是由“美国生活的元素”构成的简单的虚构世界里,代表着一种“在烧开的牛奶味道中的精神上的干枯”。尽管“电唱机男孩”在工人阶级的孩子当中并不算典型和多数,但“他们形成了一个情绪低落的群体[……]甚至比其他人更多地接触到当时软弱无力的大众趋势。他们没有任何目标,没有任何抱负,没有任何保护,没有任何信念”(Hoggart, *Uses of Literacy* 190)。

然而,通俗文化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和形塑作用却是复杂的,绝对无法用简单化的方式加以概括或分析,更无法为它们贴上各种空洞和毫无说

服力的“标签”。

在《识字的用途》中,霍加特对通俗文化的分析,不仅注意到了它们的消极方面,也注意到了它们的积极方面。比如,拿带有宗教色彩的通俗歌曲来说,霍加特首先肯定它们构成了工人阶级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它们在歌曲主题、曲调形式、演唱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它们在不同场景中会产生不同效果和作用。有些宗教歌曲体现了与较为古老的社群生活传统之间的联系,可以起到鼓舞和团结的作用。有的则可以表达低回委婉的情绪,有的却仅仅为了某种特定的表达语境。而与工人阶级审美趣味联系最为广泛的则是世俗的通俗歌曲。它们新、旧混杂,主题和表演风格各异,通常是在工人阶级聚集的小酒馆或夜总会里演唱。

周末的音乐会具有一种杂耍剧场表演者演出的歌舞表演会时代的味道。看起来是一种半专业的表演者的巨大幽灵世界,男男女女们通过经常在夜总会音乐会上的表演,轻松地为自己的正常工资增加额外收入,随着他们变得有了名气,在城市里从一家夜总会转到另一家夜总会,如果他们特别优秀,就会在方圆30英里的各个工业城市里逐步建立一个圈子。(Hoggart, *Uses of Literacy* 112-13)

有的演唱方式很传统,风格很固定,旨在表现强烈的个人情感。有的歌曲模仿美国式歌曲的风格,有的充满滑稽和幽默感,中间偶尔还夹杂着口技表演。甚至也有工人阶级尤为喜爱的、情感表达大起大落的“过山车”式的演唱风格。还有“开放式的”表演,在个人演唱到某个高潮时,自由地加入了整体的大合唱。然而,在很多场所,长期确立起来的风格一直很少有变化,这不仅是对某种特定的审美趣味的追求,而且也是为了吸引有相同趣味的特定听众。

对于青年亚文化,霍加特同样也不是一味持排斥和批判的态度,而是对其复杂性和影响作用进行了具体细致的分析。同时,他还非常关注通俗文化与严肃文化之间的关系,关注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不是将它们的关系简单化或者对立

起来。霍加特描述说,那时通俗的“粗俗”杂志涉及到的内容范围非常广泛,从个人求职、迷信算命、侦探小说、色情笑话,到科幻读物、观赏植物栽培、婴幼儿养育等等,应有尽有。

当然,在所有的青少年通俗读物当中,最值得注意的则是夹杂着暴力场景的色情小说。在《识字的用途》中,霍加特用了很大篇幅来详细分析这类小说的来龙去脉及其特征。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霍加特将细致的文本分析方法出色地运用到对通俗小说文本的分析中。他认为,“从1930年代中期以来,这类小说就已经差不多全部被从美国传来的色情小说的新风格所取代。它们可能全都受到了那类图书的出现的激励,如詹姆斯·M.凯恩的《邮差总按两次铃》;在一位最近的美国作家米基·斯皮兰的作品里,也有一些类似之处。但是,它们的根基比这要分布得更广和更深”(*Uses of Literacy* 198)。接着,霍加特对福克纳出版于1931年的小说《圣殿》中的两个涉及到暴力和色情的情节进行了细致分析,以说明后来的英国通俗小说家对福克纳的拙劣模仿。霍加特承认,“《圣殿》是公认的一部早期的粗制滥造的作品;然而,人们可以从中看出一个严肃的和无私的创造性作家的标记”(*Uses of Literacy* 205)。因而,福克纳实际上与后来的模仿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在文本分析之后,霍加特对表现暴力和色情的小说作了如下的精辟概括:

警匪小说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呆板的,充满老套的微笑,愚钝地模仿粗暴的美国人的说话,以及直白的逼真描述。它在一颠一跛、容易断气的时期里发展,那些时期伴随着富有想象力地呈现单薄和片面。然而,它无疑在某些方面具有一种生命力。它在描述受刑之痛苦的刺激感时,有时会紧跟着神经而发生变化。在它创造了虐待狂的情景时,它因此就伴随着一种粗鲁的力量;形象不再是陈腐老套的,也不再能引起神经的震颤。它直接走向了它的反面,让自身沉浸在痛苦的细节之中。在这样的时刻,它具有使人痛苦的漫画似的生命力,呈现了一种近似于平面和偏颇的体验画面。

(*Uses of Literacy* 205)

正因为对工人阶级精神生活与人格塑造产生了巨大影响的通俗文化不仅具有自身传承的脉络,而且还处在不断的发展演变之中,所以,霍加特最初在伯明翰大学创立的“中心”原本叫做“文学和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而不是“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各种“流行艺术”,包括歌曲、时装、摄影、广播和电视节目等样式。他明确地说“我感兴趣的是,我们正在创造我们自己的通俗歌曲形式,而我高兴的是,用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的话来说,‘你从来没有生活得这么好’,因为我认为,这是能够使你自已决定事情的基础之一,而不是被环境所困扰。我很高兴社会显得更加开放。我很高兴性生活的习惯正在改变,因为人们的行为较少根据单纯的指令,无论是来自教会的指令,还是来自阶级阻隔的指令,或别的什么东西”(Corner 276)。霍加特的这种看法,不仅贯穿了他的文化研究的奠基作《识字的用途》,而且也成了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基本指导思想。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霍加特从来就不认为普通工人阶级是通俗文化被动的接受者和消费者,正如他在与约翰·科纳的访谈中所说“他们不只是广告商或通俗作家的傀儡。因而,有必要创造一种人们经历过的语境,他们曾经在那种语境中接受这种大众材料,但也‘接受了’其他许多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最好说,《识字的用途》回到了我开始写教科书的起点”(Corner 272)。因而,他在对通俗文化文本的分析中始终关注从不同的方面对它们的表现形式(包括广告、封面设计、演出方式等)及其内容进行多层次的分析,注重它们对工人阶级民众的复杂影响。

从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出版以来,英国社会和通俗文化已然发生了诸多重要变化,比如,传统工人阶级城市社区的解体,城市青年亚文化出现的新变化,城市外来有色民族越来越多,资本主义经济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变,阶级斗争所采取的新形式,失业人口的规模扩大,消费社会对数量庞大的工人阶级群体的侵蚀,文化工业的扩张不断地吸纳民众的闲暇时间和金钱等。

如今,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已经不复存在,而它所开创的将文学研究的方法延伸

到社会学和通俗文化等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尤其是它所关注的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活的文化”,早已悄然演变成了大学体制内的对文化文本的研究,乃至演变为对于文本研究的研究。因而,在实际上,今天的文化研究已经走向了全然不同的方向。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Corner, John. “Studying Culture – Reflections and Assessments: An Interview with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8.

Goodwin, Andrew. “The Uses and Abuses of In-Discipline.” *The Uses of Literacy*.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8.

Hoggart, Richard. *A Sort of Clowning, Life and Times:*

1940-1959.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90.

---. *The Uses of Literacy*.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8.

F. R. 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9年。

[Leavis, F. R., *The Great Tradition*. Trans. Yuan Wei.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9.]

Leavis, F. R., *Mass Civiliz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 Cambridge: Minority Press, 1930.

Leavis, Q. D., *Fiction and the Reading Public*.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39.

Webster, Frank. “Sociology, Cultural Studies, and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A Companion to Cultural Studies*. Ed. Toby Miller.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1.

(责任编辑:王峰)

